

習主席「時代三問」擘畫中美新航程

靖偉

中美關係

5月14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同來華進行國事訪問的美國總統特朗普舉行會談。這是特朗普時隔9年再次訪華，也是繼2025年10月釜山會晤後，兩國元首半年內的第二次面對面會談。會談中，習近平主席以宏闊的歷史視野，將中美關係的前路凝練為三個必須共同回答的命題，即中美兩國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開創大國關係新範式的「歷史之問」；能不能攜手應對全球性挑戰，為世界注入更多穩定性的「世界之問」；能不能着眼兩國人民福祉和人類前途命運，共同開創兩國關係美好未來的「人民之問」。

這三道題，一個指向過去的歷史迷思，一個指向當下的全球亂局，一個指向未來的共同命運，層層遞進，勾勒出中美關係的完整邏輯鏈。

大國關係新模式的中國方案

「歷史之問」是總前提。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是否注定走向衝突？這是在雅典與斯巴達以來，國際政治上反覆出現的

追問。所謂「修昔底德陷阱」，本質上是西方歷史經驗的慣性投射，它將大國關係的敘事設定為狹隘的零和博弈。習近平主席的回答清晰而堅定：中美之間共同利益大於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機遇，中美關係穩定是世界的利好。雙方應當做夥伴而不是對手，相互成就、共同繁榮，走出一條新時代大國正確相處之道。

這不是外交辭令的簡單重複，而是充滿東方智慧的堅定回應。大國關係的劇本，不必照搬兩千多年前的舊章，更不必被西方中心主義的歷史觀所禁錮。中國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三原則，正是為大國關係開闢新模式提供的中國方案。

習近平主席提出「讓2026年成為中美關係繼往開來的歷史性、標誌性年份」，正是為這條新路確立時間坐標。2026年恰逢美國獨立250周年，亦是中國「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兩國還將分別主辦G20峰會和APEC會議，歷史的機緣匯聚於此，考驗着兩國領導人的智慧與擔當。

「世界之問」是試金石，檢驗的是大

國是否具備全球擔當。當前，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地緣衝突此起彼伏，氣候變化、人工智能治理、能源與糧食安全等議題日益緊迫，沒有哪個國家可以獨自應對。中美兩國經濟總量超過全球三分之一，兩國如何相處，本身就是世界秩序最大的變量。兩國元首會晤中，雙方同意「拉長合作清單、壓縮問題清單」，在人工智能安全、能源安全及全球治理等領域探索協同發力。

國際社會對中美合作寄予厚望，恰是因為「大國合作」在當下已成為一種稀缺品。聯合國明確指出，中美經濟關係對全球經濟「影響顯著」；媒體則評價，中美關係穩定為動盪世界提供了「稀缺的確定性」。當世界站在新的十字路口，中美能否攜手作答，關乎的不是兩國的面子，而是全人類的裏子。經貿團隊在會談前日達成的「總體平衡積極的成果」，以及特朗普代表團中英偉達CEO黃仁勳等商界領袖的身影，都表明「脫鉤」不是選項，合作才是正途。

「人民之問」是落腳點。無論中美博弈的棋局多麼複雜激烈，最終承受代價、

分享紅利的，是兩國17億多普通民眾。習近平主席指出，事實一再證明，貿易戰沒有贏家，中美經貿關係的本質是互利共贏，面對分歧和摩擦，平等協商是唯一正確選擇。這不僅是對過去幾年波折的總結，更是對未來的清醒判斷。關稅可以由政府加徵，但成本最終由企業和消費者承擔，供應鏈的中斷最終傷及的是普通人的生計。從美國農場的大豆滯銷，到中國工廠的訂單波動，貿易戰的代價寫在了普通人的賬本上。

同樣，兩國合作的利好也會落在百姓的餐桌上、工人的薪資裏、企業的訂單中。習近平主席強調，要着眼於兩國人民的福祉，這正是大國相處之道的最終檢驗標準。無論「歷史之問」還是「世界之問」，最終都要落實到民生福祉上。因此，「人民之問」要求中美兩國必須始終把民生冷暖放在心頭，讓中美合作的紅利抵達千家萬戶的餐桌與工場。

台灣問題是不可逾越的紅線

答好三道題，底線不容模糊。習近平主席明確指出，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最

重要的問題。處理好了，兩國關係就能保持總體穩定。處理不好，兩國就會碰撞甚至衝突，將整個中美關係推向十分危險的境地。「台獨」與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維護台海和平穩定是中美雙方最大公約數，美方務必慎之又慎處理台灣問題。

習近平主席重申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不可逾越的紅線，要求美方恪守一個中國原則。這是原則的宣示，也是風險的邊界。元首外交之所以被稱為中美關係的「定盤星」，正在於它能夠在最敏感的問題上建立戰略護欄，避免局部摩擦滑向系統性危機。

要回答好「歷史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這三個命題，不能停留在口號上，需要中美兩國增強互信，攜手合作，問題共答。而且，中方已經給出清晰的答題思路：以對話代替對抗，以合作對沖風險，以相互成就替代零和博弈。國際社會相信，中美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不僅是可能的，更是時代賦予兩個大國的共同責任。

國際關係學者

從香港視角看中美元首會晤紅利

明旭

議事論事

中美元首會晤，舉世關注，既是牽引全球政經格局的核心大事，更是直接關乎香港發展前景、社會穩定與國際定位的關鍵節點。在習近平主席和特朗普總統的共同引領下，兩國一致同意建立「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對全世界的和平穩定和發展，都具有重大的戰略性意義，而這也為擁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優勢的香港帶來重要的機遇和拓展更大的發展空間。從香港角度觀察此兩國元首會晤，可從地緣政治「減壓」、國際金融「定錨」、原則底線「加固」的三大維度，更好地把握會晤帶來的深層影響與積極意義。

帶來穩定性、安全性、確定性

其一、地緣政治「減壓」。香港作為開放型國際城市，長期處於全球地緣政治交匯點，過往大國博弈升溫、國際局勢緊張，往往容易被外部勢力借題發揮、趁機干擾，將香港捲入爭拗漩渦，拖累經濟復甦、撕裂社會共識。過去數年，地緣紛擾疊加國際競爭，不僅衝擊香港外貿航運、投資信心，更成為外部勢力滲透插手香港內部事務、製造社會爭議的藉口，令香港難以集中精力搞經濟、謀民生。

習主席在會面中強調，「中方致力於中美關係穩定、健康、可持續發展。我同特朗普總統贊同將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作為中美關係新定位，將為未來3年乃至更長時間的中美關係提供戰略指引，相信會受到兩國人民和國際社會的歡迎。」中美兩國新型「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無疑會為世界帶來巨大的穩定性、安全性和確定性。

中美重回鞏固常態溝通渠道，恪守不衝突、不對抗的底線思維，有效壓縮了外部勢力藉機干預香港事務的操作空間。對香港而言，最大實惠就是發展空間更大、更穩定，來自外部的政經壓力會有所減弱，社會能進一步聚焦發展，輿論焦點、社會資源可重新聚焦於樓市穩定、就業保障、產業轉型、安老福利等民生實事，為香港騰出安穩的外部環境與內部氛圍，一心一意謀發展。

與此同時，地緣緊張降溫亦帶動環球避險情緒回落，區域經貿往來、跨國投資併購、航運物流布局重回穩定節奏。香港作為區域樞紐，轉口貿易、專業服務、會展商旅等板塊直接受惠，中小企業經營環境趨於寬鬆，各行各業得以在低波動、低對抗的外部環境中穩步復元，為經濟溫和向好奠定基礎。

其二、國際金融中心「定錨」。香港是全球離岸美元、離岸人民幣雙樞紐，實施聯繫匯率制度，資本市場、資金流動、資產定價與大國貨幣政策、雙邊關係高度綁定，中美關係緊張每每引發港股波動、資金進出反覆、國際投資者觀望情緒升溫，直接動搖香港金融市場的穩定性與國際公信力。

此次元首會晤釋放管控分歧、避免經濟金融領域極度對抗的信號，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起到關鍵定錨作用。首先是市場預期修復，不明朗因素紓緩，環球資金風險偏好回升，有利港股、匯市及資產市場走勢平穩，穩住國際投資者對香港市場的長期信心。其次是離岸金融業務受惠，中美避免金融脫鉤、維持跨境金融往來常態化，有利香港離岸人民幣清算、債券發行、跨境理財通、基金互認等互聯互通機制持續擴容，強化香港作為人民幣國際化樞紐的不可替代角色。

與此同時，全球跨國企業、金融機構重新審視亞太布局，香港憑藉普通法法治、低稅制度、專業服務集群的優勢，再度成為跨國企業設立區域總部、財資中心、風險管理中心的首選地。綠色金融、可持續投資、數字金融等新賽道亦隨着國際局勢趨穩迎來合作空間，助力香港金融業從傳

統融資中介向高端資產管理、風險仲裁、綠色標準制定升級，牢牢站穩全球頂級國際金融中心席位。

其三、原則底線再「加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的根本底線，也是香港長治久安、繁榮穩定的根本前提。過往外部勢力往往藉大國博弈之機，意圖插手香港事務、挑釁憲制秩序、破壞國家安全，妄圖動搖「一國兩制」實踐根基，損害香港穩定發展大局。

此次習主席在元首會晤中，始終堅守原則底線，堅決維護國家核心利益與重大關切，清晰傳遞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反對外部干涉的堅定立場，事實上是對香港憲制秩序與「一國兩制」底線的再確認、再鞏固。會晤釋放的共識與信號，進一步壓縮外部勢力藉各種藉口干預香港事務、滲透香港社會、蠱惑青年群體的空間，為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完善治理體系、落實良政善治營造有利外部條件。

守住安全底盤發揮制度優勢

底線穩，則大局安；大局安，則發展興。「一國兩制」底線獲得國際層面更清晰的認知與尊重，香港得以在國家堅強後

盾之下，守住安全底盤，同時充分發揮制度優勢，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創科產業布局等重大戰略。既可堅守自身獨特制度、法治環境、自由市場優勢，又能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在「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定位上走得更穩、更遠，讓「一國兩制」持續展現強大生命力與制度優越性。

當前全球經濟復甦曲折、地緣風險仍存，此次中美元首會晤以對話代替對抗、以管控代替摩擦，為世界注入確定性，更為香港帶來地緣「減壓」、金融「定錨」、底線「加固」的三重紅利。

當然，國際關係不會呈直線發展，過程必然會有各種曲折，中美關係也不可能一直一帆風順。但此次中美元首會晤創造了當前世界最急迫需要的穩定性、安全性和可確定性，意義重大。香港有國家作為強大後盾，「一國兩制」的優勢將得以最大程度發揮。香港社會應把握民生、珍惜局面，集中力量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強化產業、提升競爭力，善用平穩窗口期，鞏固提升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在守牢「一國兩制」底線的基礎上，把握國家發展機遇，加快實現發展升級。

公屋輪候創新低 施政惠民破困局

卓銘

新聞背後

房屋局昨日公布，最新一季公屋綜合輪候時間已縮短至4.7年，創下8年多以來新低，甚至有望於2026/27年度進一步縮短至4.5年。公屋輪候時間高企，長期以來都是香港民生問題的最大痛點之一，然而，在特區政府多年來的不懈努力下，「老大難」問題正逐步得到確實解決。這不光是政府施政以民為上的體現，更象徵政府迎难而上、以改革推動破局的決心。

與上一季相比，最新一季的公屋綜合輪候時間下降了0.4年，據房屋局表示，最新紀錄是截至今年3月底，統計過去一年獲安排入住傳統公屋或簡約公屋的一般申請者情況所得，與本屆政府上任前的高位6.1年比較，公屋綜合輪候時間縮短了整整近一年半，並首次低於5.0年。房屋局發言人指出，由於下一季一般申請者入住傳統公屋或「簡約公屋」的數目會較今季低，預計下一季的公屋綜合輪候時間還會有輕微起伏，但預期仍會在5.0年「封頂」。意味着公屋綜合輪候時間，在可見未來仍會繼續呈下降趨勢。

「4.7年」這個數字雖然看起來普通，但取得如斯成果的背後卻殊不容易。本屆政府自上任以來，就一直貫徹「提量、提速、提效、提質」四大方向推進房屋建設。

首先是提出「簡約公屋」這種全新的過渡性方案，既能快速提供可負擔居所，又為傳統公屋騰出空間，實現雙軌並行。相比現時市區傳統公屋輪候為約6年，位於新界簡約公屋的輪候時間僅為2年，上季有近半申請者選擇入住簡約公屋，可見簡約公屋越來越受市民認可，達到政策原定的目標。這是公屋輪候時間明顯減少的重要原因。

其次，特區政府亦針對公屋的現有問題，收緊富戶政策，加強打擊濫用情況。公屋本是低收入市民重要的房屋援助措施，但過去一段時間以來，少數人卻鑽制度空子，濫用公屋，結果令真正有需要的市民得不到支援，反加深了社會的不公平現象。近年政府就收回了近萬個公屋單位，使公屋流轉效率加快，而房協也在去年9月起實施「富戶政策」，向2萬多個未受規管的舊租約住戶發出新租約，料今年內可將所有舊租約轉為新租約。

「民生為本」的最佳體現

在積極檢討現行公屋資源分配的同時，政府亦採取了情理兼備的態度。例如對長者住戶，充分考慮到新租約較為複雜，因此在程序上先由較年輕租戶入手，一方面令長者租戶得知鄰居等大部分人都轉新租約，在心理上預先感到安心，並預留時間供長者諮詢。

再次，特區政府大力推動北部都會區發展，在收地、建屋等基礎程序上實現了拆牆鬆綁，展現了短期紓困和長遠規劃相結合的智慧。具體包括提出訂立專屬法例，建議簡化北部內「非保育地帶」規劃申請程序，並計劃將規劃大綱中的「臨時用途」用地期限放寬至最多7年，以及加快支付被收回土地的補償。可以預料，從明年起內的五年內，無論是傳統公屋還是簡約公屋的供應，都將進入高峰期，這正是政府估算公屋輪候期將進一步收縮的最大底氣。

隨着落實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香港選舉制度，長期阻撓、破壞特區政府施政的重重阻力已被破解，香港實現了由亂到治的根本性轉變，開啟了由治及興的新篇章。在愛國者治港原則

下，香港踐行基本法規定的行政主導，行政和立法相互配合，施政效率顯著提升，這從根本上為加快公屋輪候、解決居住問題提供保障。

當前正是香港發展的關鍵期，國家正式進入「十五五」時期，香港亦加緊步伐制定首份五年規劃。在過去，香港面對房屋問題多數時間只依賴短期措施，在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中，土地與房屋往往只被視作單一章節，沒有與整體的人口、經濟及社會政策對齊，結果往往出現「治標不治本」的情況。但五年規劃的提出，意味着香港在房屋及土地供應方面將建立一系列長遠、綜合的統籌機制，形成跨部門合作，全面配合長遠的交通基建、社區配套及產業布局，並確立長遠規劃方向與指標。

事實上，解決問題已經不能只將視野放在香港內部，如何用好國家機遇和周邊地區的資源，是香港破局的最大關鍵。上月正式公布的廣東「十五五」規劃中，首次提出積極对接香港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協同開展園區開發、產業導入、項目布局、設施建設、人才引進、生態環保等領域合作。現時政府已視北都為突破房屋問題的重要抓手，因此與廣東等地的合作，不單是在推動北都產業的發展，其實也是在為香港解決土地及房屋問題創造新契機，比如說推動香港北面的土地重新布局，整合深圳河南岸周邊的土地資源，打造出一個宜業宜居的新型社區。

房屋問題可謂香港社會尤其是基層最關心的民生問題，各界期待，有關部門能以高度負責任的態度，積極主動作為，強化執行能效，務求讓每一名港人都能住得其所、安居樂業。

沉着應對燃油危機 強化國際航空樞紐地位



戴子超

有話要說

中東局勢瞬息萬變，和平何時真正重來尚未可知。由於中東眾多機場隨時被戰火波及，大量旅客紛紛取消在中東轉機，令亞洲各國往返歐洲的直航航班一票難求，票價亦居高不下。與此同時，戰火造成的航空燃油短缺、價格急升，各大航空公司因而陸續調升燃油附加費，令不少市民認為航空公司趁機大發「戰爭財」，牟取暴利。然而，實際上，燃油開支普遍佔航空公司營運成本的三成以上。面對燃油價格飆漲，燃油附加費只能抵銷部分價格上漲幅度。換句話說，此舉是航空公司與消費者共同分擔燃油成本上升壓力的無奈舉措，並不能為航空公司帶來額外利潤。

值得注意的是，在當前極端的地緣政治環境下，全球航空業慣常採用的成本管理措施效果受限，難以完全抵銷油價飆升。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公布，截至4月中旬，航空公司的實際燃油成本較2月底翻倍，營運壓力大幅增加。戰爭帶來的不穩定因素已導致航空業界減少航班，甚至撤出航線。如情況持續，航空業界面對的困境將越來越嚴峻。

供應鏈穩健緩衝外部波動

在此複雜多變的環球局勢下，香港國際航空樞紐憑藉其穩健的供應鏈基礎，展現出獨特的韌性。香港國際機場的航空燃料採購渠道，有效緩衝了外部市場的劇烈波動，為營運者提供了寶貴的可預期性。

自2024年11月香港機場三跑道系統全面啟用後，香港航空業復甦勢頭良好，在香港國際機場營運的航空公司數目已增加至140間、航班服務航點亦超過220個，貨運量穩坐世界第一的寶座，是名副其實的國際航空樞紐。

本月27日，香港國際機場二號客運大樓將正式啟用，勢必為業界發展注入新動能。屆時將有15家航空公司分階段進駐。二號客運大樓在設計概念、科技運用和自助服務方面將顯著提升，相信將為旅客帶來更流暢便捷的嶄新體驗，並進一步強化機場處理高客流的能力，為航空公司創造更優質的營運環境。

香港擁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香港航空業界應緊緊把握三跑道系統及二號客運大樓帶來的各種機遇，沉着應對此次燃油危機，為香港國際航空樞紐增添活力，為香港經濟書寫新篇章。

成都市政協委員